

近 30 年中国满文研究评述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——赵志强

自 1980 年以来，我国学者充分利用天时、地理、人和的有利条件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深入研究满文的兴盛衰败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也有力地促进了满学的繁荣和发展。值此纪念满文创制 410 周年之际，审视既有的学术成就，有利于开创未来的研究道路，是一件颇有积极意义的事情。

近 30 年间，我国满文研究成果和涉及满文较多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。据粗略统计，已出版学术专著、辞书和教材共 10 余部，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，其中：有综述性的论文 5 篇，专门研究满文创制、改进、满文字母读音、满文历史贡献、满文篆字的论文各 10 篇左右，探讨满文衰落、满文与其他民族文字的关系以及满文翻译等问题的论文各 5 篇上下。按其质量，参差不齐，差距较大。然而，就其总体而言，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我国现阶段满文研究的能力和水平。

下面，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，从三个方面略陈管见。评述的内容难免涉及在座诸位学长、同仁的某些学术观点，赞同与否，旨在切磋。不当之处，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1. 关于满文的创制

关于满文创制的研究成果大同小异。诸如创制的时间、地点以及方式方法，研究者没有异议，都遵从《满洲实录》等文献记载。对于创制的原因、意义和价值，则见仁见智，并超出了文献记载。此外，关于满文的创制者，有人认为是弩尔哈齐、额尔德尼、噶盖三人，有人主张出自额尔德尼一人之手。诸如此类，还需要进一步论证。

尤其值得认真研究的是，初创的文字究竟如何。从实际情况看，老满文存在诸多弊病，不易辨识。清太宗有言：“十二字头，原无圈点。上下字无别，‘塔’‘达’‘特’‘德’、‘扎’‘哲’‘雅’‘叶’等雷同不分。书中寻常语句，视其文义，易

于通晓。至于人名、地名，必致错误。”³此言常被今人引用，而关键之处标点不尽一致。或断为“塔达、特德、扎哲、雅叶”，或断为“塔、达，特、德，扎、哲，雅、叶”，似乎只是塔（DA）与达（[A]）、特（TA）与德（[A]）、扎（JA）与哲（JX）、雅（YA）与叶（YX）的书写形式雷同不分。其实，塔、达、特、德四者雷同不分，均作 DA，扎、哲、雅、叶四者雷同不分，均作 JA，例如张字档第 573 页。由此可见，今之研究者或不通老满文，或没有认真研读老满文史料和相关辞书，想当然地仅以圈点之有无为标点的依据。

老满文的音节字母同所借蒙古文字母一样，自有其书写规范。有学者认为，老满文的字母形式极不统一，一个字母往往有多种书写形式。也有学者认为，一个字母往往有两三种乃至四五种写法。这恐怕言过其实了。清太宗说：“书中寻常语言，视其文义，易于通晓。至于人名、地名，必致错误。”试想，如果老满文字母的书写形式果真如此，还能“易于通晓”么？实际上，老满文字母的书写形式并非极不统一，也不是一个字母同时有两三种乃至四五种写法。有些字母书写形式的前后有变化，除笔误之外，可能与文字的改进有关。某些单词的书写形式与新满文不同，似与文中口语连读之音、方言差异等密切相关。如 emu（一）一词又作 nemu，并出现在 juwan（十）、orin（二十）等尾音为 -n 的单词后面，显然是口语中 -n 与 e 连读之音的真实记录，不能认为元音字母 e 有 e、ne 两种形体。凡此种种，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。

2. 关于满文的改进

关于满文的改进，主要有老满文改进的时间、改革的具体内容和乾隆时期的文字规范三方面的论述。

满文创制以后，何时施行改革，其说不一。主要有三种说法：一为天命年间说；一为天聪三年说；一为天聪六年说。孰是孰非，可以继续争论，以求最终取得共识。我个人认为，天聪三年说可能是个误解，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。老满文的改革始于天命年间，至天聪六年大功基本告成了。

老满文的改革始于天命年间，在《无圈点档》中留下了诸多痕迹，例如：辅

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：满文老档（下），第 1196 页。中华书局出版，1990 年。

音字母 c 的书写形式，起初与 j 的书写形式无异，而天命六年已有接近新满文 c 的书写形式，见张字档第 579、580 页的 hecen 与 cira。天命七年已有与新满文一样的书写形式，见张字档第 585 页的 cooha 和 587 页的 coko。又，记事自天命八年（癸亥）正月至同年五月的冬字档中，部分词汇带有圈点，但与新满文不尽相同，如第 1532 页。这些情况，似乎可以作为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的实证。

天聪六年正月十七日，皇太极颁布改进后的满文十二字头。是所谓“新满文”，或称“加圈点满文”。对此，学者多有论述，恕不赘言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，达海增添的 24 个“新字”，都是音节字母，都有独特的书写形式。有些学者依据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的方法，分析其元音和辅音，并与原有的正字比较之后，指出达海实际上只增加了三个新的辅音和两个舌尖音。从语言学的角度看，这是正确的。但从文字学的角度看，似乎又不太符合满文的实际情况，且难免许多形异音同、形同音异的现象以及繁琐的解说。二是，改进十二字头颁布之时，并没有完成老满文向新满文的过渡。据《地字档》记载，从天聪六年十月初十日起，音节字母 Ko-V Go-V Ho-V 的书写形式才与新满文一样了，例如：8-3865、8-3874-3875。另据《字字档》记载，音节字母 Q Q1 Q0 在崇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还有老满文的书写形式，如 10-5359，自十六日起，除个别单词外，不再使用老满文的书写形式。

至于乾隆时期的文字规范，虽然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，但评价甚高。有学者认为，乾隆时期是满语文发展的重要时期，规范、发展和完善了满文，并以满文的规范化而促进了满语的发展，因此，乾隆时期也是满语文发展的高峰时期。对乾隆帝本人在这方面的功绩，也给予充分的肯定。只是对其负面影响关注得不够，甚至忽略了。

乾隆帝在规范、发展和完善满文的过程中，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举动。众所周知，汉字是表意文字，同音词较多，而满文是拼音文字，不同于汉字。两者之间，存在“一对多”的关系。譬如，把“汗”和“韩”两个汉字，用满文转写，都写成 HaA (han)。乾隆帝认为“汗”和“韩”读音有细微的差别，想把这种差别表现在音写的满文上。他说，把“汗”写成 HaA (han)，“韩”写成 HaA (han) 并在左下方点一“点”，就可以将两者区分开来。他知道汉字中同音字多，不可能在转写的满文上逐一加“点”，但仍然坚持有些东西必须区分，并令臣工照猫画虎。其结果不言而喻，根本就行不通。乾隆帝曾规定：多人共同奏折，若是奏事折，

仍用 **Sxl** (sei) 即表示复数的 **SX** (se, 意为: 等、们) 与助词 **l** (i, 意为: 之、的) 合写形式; 若是请安折, 则不准用 **Sxl** (sei), 只能用 **SX** (se)。后一条规定显然违背满语的语法, 臣工为此蒙受训斥者不乏其人。诸如此类, 规范过度, 反而影响了满文的应用。满文的衰落, 与此不无关系。因此, 对于乾隆帝规范满文的功过是非, 也需要实事求是, 避免以偏概全。

3. 关于满文字母的读音。

对于满文音节字母的读音, 研究者采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, 分为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, 并研究其读音, 提出了各自的看法。

从研究结果来看, 对满文辅音字母读音的研究缺乏新意。因为这些辅音字母的读音, 凭借清代有关辞书的准确标注和延续至今的满语文教学实践, 未尝失传。研究者无论利用什么资料, 采取什么方法, 都不能改变其读音。我认为, 与其研究它们怎样读, 不如探讨这样读的原因。譬如, 音节字母 **SA** (sa)、**SX** (se) **SI** (si) 的辅音相同, 但在音节字母 **SI** (si) 中, 实际读音不同, 为什么? 探讨这样的问题, 也许更有意义。

对元音字母读音的研究虽有新意, 但多数不切实际。尤其对新满文元音字母 **yo-V** 的读音, 众说纷纭, 莫衷一是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 必须追根溯源, 从老满文开始探讨。

满语有五个元音, 其中“o”和“u”在老满文中都有阳性、阴性两种形体。阳性形体都是 **yo** (o、u), 阴性形体都是 **yo-V** (ō、ū)。因此, 在老满文中, 五个元音表现为七种书写形式, 即: **yA** (a)、**yE** (e)、**yl** (i)、**yo** (o)、**yo-V** (ō)、**yo** (u)、**yo-V** (ū)。

yo (o) 与 **yo** (u)、**yo-V** (ō) 与 **yo-V** (ū), 形体虽同, 读音相异。**yo** (o) 与 **yo-V** (ō)、**yo** (u) 与 **yo-V** (ū) 虽然形体、属性不同, 但读音相同。

满语元音“o”和“u”在老满文中的阴阳两种形体, 源于蒙古文字母, 但在满语中, **yo-V** (ō)、**yo-V** (ū) 都不是长元音, 也不是另一个单独的元音, 只是元音“o”、“u”的阴性形体。

yo (o) 与 **yo-V** (ō)、**yo** (u) 与 **yo-V** (ū) 分别作为元音“o”、“u”的阳性形体、阴性形体, 读音相同, 也没有区分意义的功能, 因而在单词中可以互换。例如《张字档》573 页的 **tondo** (正直) 与 657 页的 **tōndo** (正直), 587、658 页的

bōso (布) 与 629 页的 boso (布), 609、610 页的 dolo (内) 与 628、686 页的 dōlo (内), 1032 页的 mogcoho (折断) 与 1125 页的 mōgcoho (折断)。又如该档 643 页的 ulin (财) 与 647 页的 ūlin (财), 573 页的 ulgiyan (猪) 与 674 页的 ūlgiyan (猪), 575、577 页 gurun (国) 与 595、598 页的 gūrun (国)。

在老满文中, 元音字母 u 与辅音字母 q、G、χ 结合, 构成音节字母时, 用其阳性形体 yo (u); 与辅音字母 k、g、h 结合, 构成音节字母时, 多用其阴性形体 yo-V (ū)。例如:《张字档》574 页的 quwaran (院子)、同页之 Gunime (想念)、576 页的 χuda, 612 页的 kūren (股、馆)、598 页的 gūrun (国)、612 页的 hūnehe bira (浑河)。这样的结合, 符合满语的元音和谐律。曾有学者认为, 第六元音的特点是只能和固有辅音中的小舌音 q、G、χ 相拼构成音节。其实, 从上面各例来看, 完全说反了。

元音字母 u 与辅音字母 k、g、h 构成音节字母时, 尽管当初阴差阳错, 存在使用其阳性形体的现象, 但一般还是使用其阴性形体, 且持续时间也较长。自崇德元年十二月中旬以后, 才弃阴用阳。从元音和谐的角度来看, 这是满文改革的一大败笔。

辅音字母 q、G、χ 与元音 o、u 的阳性形体构成的音节字母, 即 qu、Gu、χu、qo、Go、χo, 起初形体雷同, 均作 Ko。天聪年间施行文字改革, 施加圈点。于是, 形体雷同的 Ko (qu)、Ko (Gu)、Ko (χu) 变成 Ko (qu)、Go (Gu)、Ho (χu), 彼此有了区别。同时, 形体雷同的 Ko (qo)、Ko (Go)、Ko (χo) 也变成 Ko (qo)、Go (Go)、Ho (χo), 彼此有了区别。

然而, 音节字母 Ko (qu) 与 Ko (qo)、Go (Gu) 与 Go (Go)、Ho (χu) 与 Ho (χo) 的形体依然雷同, 天聪六年六月《地字档》第 8-3818 页有若干 qu、Gu 等音节字母, 可资为证。于是, Ko (qu)、Go (Gu)、Ho (χu) 中元音 u 的阳性形体被改造, 也可以说为其阴性形体所取代, 使三者的形体分别变成 Ko-V (qu)、Go-V (Gu)、Ho-V (χu), 与 Ko (qo)、Go (Go)、Ho (χo) 的形体有了区别。这是天聪六年十月初十日以后发生的事情。显然, 这种变化纯粹是为了解决辅音字母 q、G、χ 与元音 u、o 结合成音节字母时产生的形体雷同的问题。

在研究满文元音字母的读音, 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变化过程, 或许能够消除纷争, 达成共识, 彻底解决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难题。